

■ 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 陈锋 主编

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

■ 陈锋 主编



■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 陈锋 主编

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

■ 陈锋 主编

■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陈锋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1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陈锋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ISBN 7-307-04624-5

I. 明… II. 陈… III. 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15世纪~20世纪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62399号

责任编辑:王雅红

责任校对:王 建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whu.edu.cn)

印刷: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80 1/16 印张: 57.125 字数: 1147千字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7-04624-5/K·272 定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陈 锋

15至20世纪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从萌芽、起始到发展、变化的时期。而长江流域又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按照施坚雅（G. W. Skinner）的区域发展理论，在明清以来中国的九大区域中，长江流域即占三个（长江下游、中游、上游）。因此，对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加以综合系统的研究，展现长江流域的发展规律与特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既可以推进渐次成为热点的区域研究和流域研究，也可为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所借鉴。

迄今为止，对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既有对该流域的专题研究，如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雪英、毛振培主编：《长江流域重大自然灾害及防治对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又有整体性的历史考察，如万绳楠等：《中国长江流域开发史》（黄山书社1997年版）。除了把长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外，更多的是对长江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区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以长江下游的研究最为突出，重要的著作如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徐泓：《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台湾嘉兴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2年版），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洪焕春、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议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森正夫：《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范金民、夏

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版），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叶树声、余敏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玫：《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

长江上游的研究虽然没有下游地区那样繁盛，但也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张学君、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魏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彭朝贵、王炎主编：《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天地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

相对于长江上下游的研究，长江中游地区的研究要薄弱一些。当然，相关研究也一直在进行。还在1986年，就由中国唐史学会、武汉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召开过“三至九世纪长江中游社会经济讨论会”，会后，由黄惠贤、李文澜主编的会议论文集以《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为名，1988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1989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牟发松的专著《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1996年，又有台湾学者黄玫茵的《唐代江西地区开发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出版。这些研究虽然偏重于魏晋隋唐时期，但已经表明学者们对长江中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注。另外，陈钧等主编的《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版), 是对一个省区进行专题性纵向研究的较早的成果。鲁西奇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对汉水流域进行了集中的研究。近年又有分省区的通史著作问世, 如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惠主编的多卷本《湖北通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等。这又从另一个层面标示出长江中游地区研究的多角度开展。在对明清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的相关研究中,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81 年版),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湖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82 年版), 罗威廉:《汉口: 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 1796~1889》及《汉口: 一个中国的城市冲突和社区, 1796~189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1989 年版), 梁森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皮明麻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罗福惠:《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武汉出版社 1994 年版), 吴量恺主编:《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及《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郑焱:《近代湖湘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李宪生:《两次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值得重视。

从总体上看, 对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研究的重视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与区域研究的兴起基本上一致。由于长江流域分为下游、中游、上游三个区域, 在以往的研究中, 应该说更多的具有区域研究的色彩, 但长江流域毕竟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带, 对长江流域的整体研究也许更为重要, 但还存在着缺憾。在前此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由我牵头申报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研究课题“15 至 20 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 试图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经过教育部专家组的论证, 得到认可。但在课题研究的短短三年中, 全面的系统研究几乎不可能, 好在有研究群体的协作, 才完成了这套书系。由于受研究时间和研究能力的限制, 我们确定了三个努力的方向: 一是从总体上对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的社会发展做专题性的论述, 如《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二是对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 如《明清长江流域山区开

发与社会变迁》等。三是对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的长江中游地区进行较为集中的探讨，如《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等。不管是哪一个方面的研究，在选题上都是前此学者较少涉足的，至少，我们的初衷是如此。当然，这套书系也只是我们初步的研究成果，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希望读者指导和批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课题的研究，自始至终都得到了教育部社政司以及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学部陈广胜部长等的关心和支持。在课题研究和成果出版过程中，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仁以及武汉大学出版社江建勤社长、张俊超副总编也给予了帮助和支持，特此表示感谢。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国家高等社会科学院魏丕信（Pierre-EtienneWill）教授，美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王笛教授，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等应邀提供稿件，也为本书系增色不少。

2003年5月29日

目 录

第一编 长江上游的人口、公共领域与税收

- 第一章 清代长江上游的移民…………… 3
——四川与西南的移民政策与移民考察
(作者: 武汉大学 陈锋)
- 第二章 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粮食问题 …… 31
(作者: 美国得克萨斯 A&M 大学 王笛)
- 第三章 17~19 世纪秦巴山区的人口变动 …… 69
(作者: 武汉大学 张建民)
- 第四章 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的开辟: 以成都城市公园为例 …… 98
(作者: 四川大学 李德英)
- 第五章 晚清公共领域中的地方士绅、官僚与国家权力关系 …… 140
——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中心
(作者: 美国得克萨斯 A&M 大学 王笛)
- 第六章 清季民国年间长江上游地区的鸦片税捐(厘) …… 158
(作者: 西南民族大学 秦和平)

第二编 长江中游的市镇与农村

- 第七章 明清市镇的发展状况及其评价指标体系 …… 187
——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
(作者: 武汉大学 任放)
- 第八章 城墙内外: 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府、州、县城的形态
与结构 …… 228
(作者: 武汉大学 鲁西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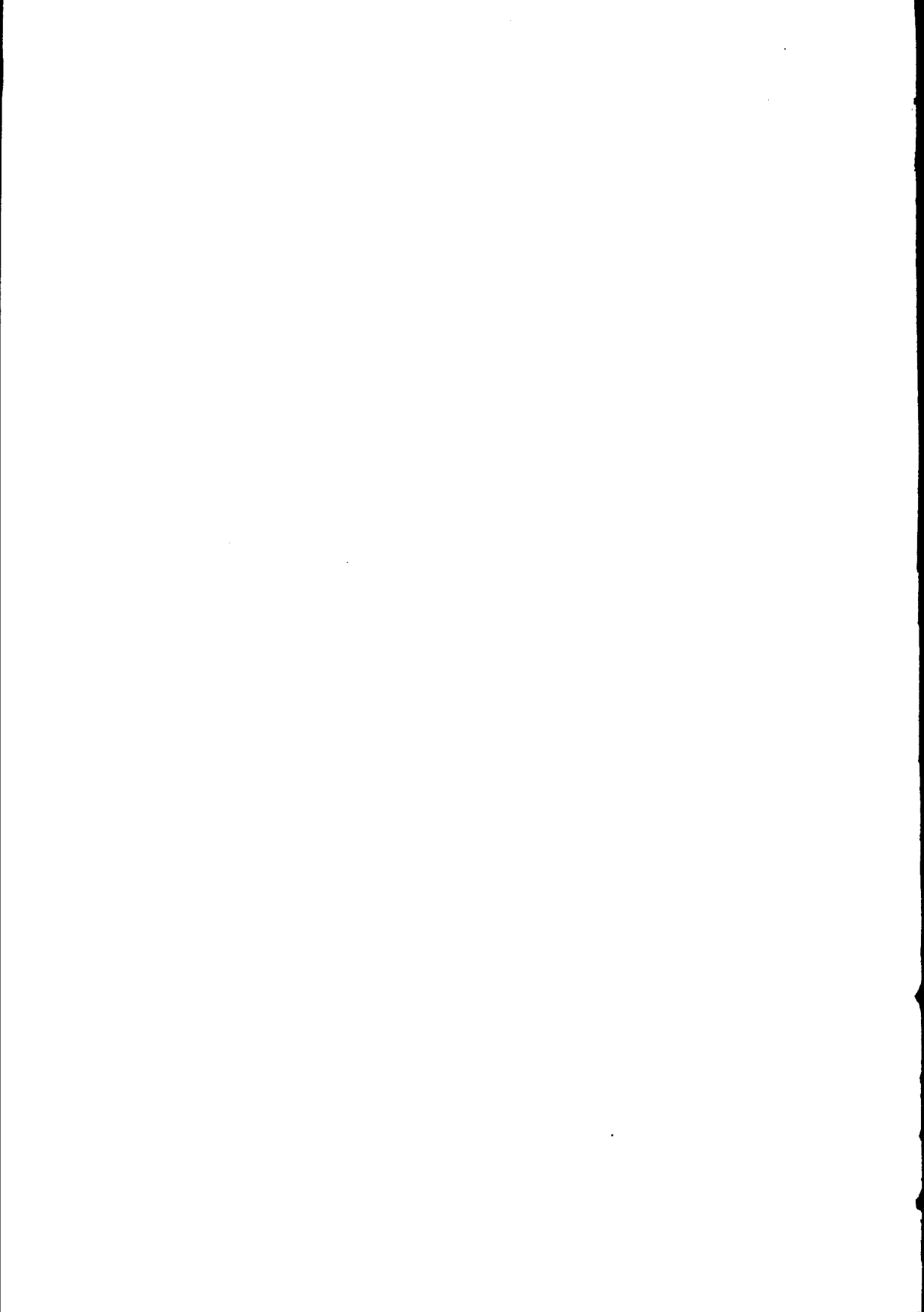
- 第九章 清代汉口茶叶市场研究** 292
(作者: 武汉大学 杜七红)
- 第十章 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与农村社会** 335
(作者: 武汉大学 白丽萍)
- 第十一章 长江中游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变迁 (1368 ~ 1911 年)** ...
..... 382
(作者: 武汉大学 杨国安)
- 第十二章 内地的边缘** 431
——明清时期湖北省郧西县地域社会史的初步考察
(作者: 武汉大学 鲁西奇 杨国安 徐斌 江田祥)
- 第十三章 明清以来长江中游回族聚落变迁的文化解读** 494
(作者: 中南民族大学 许宪隆 李勇军)
- 第十四章 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家庭、宗族与社会保障** 541
——基于长江中游三省的考察
(作者: 武汉大学 周 荣 鄂州市燕矶中学 周长艳)
- 第十五章 水利基础设施管理中的国家干预** 614
——以中华帝国晚期的湖北省为例
(作者: 法国国家高等社会科学院 魏丕信 译者: 魏幼红
校者: 鲁西奇)
- 第三编 长江下游的市镇、农村与文化**
- 第十六章 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城市文化** 651
(作者: 南京大学 范金民)
- 第十七章 清代前期徽州民间的日常生活** 675
——以婺源民间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为例
(作者: 复旦大学 王振忠)
- 第十八章 长江下游文化变迁中的“新小说”** 727
——以 19 世纪后期的谴责小说为中心
(作者: 武汉大学 王同舟 陈文新)
- 第十九章 江南市镇早期现代化建设的一次尝试** 760
——以菱湖战后重建 (1945 ~ 1949 年) 为例
(作者: 华中师范大学 彭南生)

第四编 长江流域的个案考察

- 第二十章 明至清中叶长江流域的西器东传** 779
(作者: 武汉大学 谢贵安)
- 第二十一章 中华帝国晚期国家对水利的管理** 796
(作者: 法国国家高等社会科学院 魏丕信 译者: 林清清
校者: 鲁西奇)
- 第二十二章 城市政府组建与民国前期的城市建设和管理** 811
——以长江流域城市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 国防科技大学 赵 可)
- 第二十三章 当代长江流域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研究** 880
(作者: 武汉大学 周长城 王小宇 张峻豪)

第一编

长江上游的人口、 公共领域与税收



第一章 清代长江上游的移民

——四川与西南的移民政策与移民考察

人口问题既是一个社会问题，又是一个经济问题。在传统社会中，招徕、增加人口被看作是恢复社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甚至是衡量社会经济水准的一个标尺。人口迁移的动因、性质、类型及其结果，也与社会经济多有关联。本章在总体缕述人口迁移的动因与类型的基础上，重点讨论清代长江上游的移民政策与移民问题。

一、人口迁移的动因与类型

这里所说的“人口迁移”，基本上与“移民”同义，是指在空间上离开本土迁入新区入籍，或在时间上多年移居新区但并未入籍的区域间人口移动，与短暂游离本土的“游民”、“流民”相别。尽管对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作这样的划分相当困难，但如果没有这种概念上的界定，则很难对人口迁移政策做出恰当的分析。一般地说，“移民”更多地具有政策导向色彩，组织性、流向性、目的性明显；“游民”、“流民”就有所不同，或“四处游食”，或“流为盗贼”，更多地具有自发倾向。

按照人口学中的人口迁移“推拉理论”，人口迁移是推力与拉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口迁出地（本土）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对本地人民形成一种向外排挤的推力，而人口迁入地（新区）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又形成一种吸引移民的拉力，这两种力量交互作用，或其中的一种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就会有空间上的人口移动。各个区域的自然条件有好有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总是不均衡的，因此，从理论上说，不论何时何地，都会有人口的迁移。

不同的自然条件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迁移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人口迁移的动因，但绝不是惟一的动因。在历史上，战乱、灾荒以及政策性的政治移民、经济移民等都曾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种人口迁移的动因至少与自然、经济条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乱、灾荒年代，人口的迁移并不顾及此区彼区的自然、经济条件，大多以安身谋生为指归。如明末清初，战乱频仍，流民遍野，既有省内、

省际间的人口流动，又有东西南北间的人口大迁徙，所谓“自遭明季之乱，人民流离，田庐荒芜”，“东连燕赵，西接秦川，流民络绎如线”^①；所谓“比年兵事未息，供亿孔殷，加以水旱频仍，小民艰食，地方官不加抚绥，以致流离载道”^②；所谓“国初东南未靖，人民流离，多糊口于北方”^③，等等，都是指的这种情况。又如，“江南顺治七、八两年（1650年、1651年）遭大水，九年复遭大旱，饥民流离，饿殍载道”^④。顺治十年（1653年），河北淫雨为灾，河水汎溢，沿河城郭庐舍漂没殆尽，“直隶被水诸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⑤。紧接着，山东亦发生水灾，山东饥民也“逃亡甚众”^⑥，各处饥民辗转流徙。

因战乱、灾荒出现的“流民”，是一种临时性的逃徙流亡，其目的是为了躲避战乱和逃避自然灾害，还顾不上对流入区域的自然经济条件的选择。当战乱平息或自然灾害过后，流民大多会归复本土，当然，也会有一部分流民在辗转流徙之后在某一新区定居下来，成为新区的移民。这也正是“流民”与“移民”不同而又互相牵涉的内涵所在。

我们还注意到，清代的政策性经济移民，大多是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狭人稠的地区，移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广人稀的地区，迁出地的自然经济条件远比迁入地优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相悖。导致这种经济移民的动因，除了政策的指引、规范、鼓励外，如果说迁出地和迁入地还有“推拉”作用的话，那就是：迁出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高的人口密度^⑦，使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缺地少产者——的谋生出现困难，在客观上推动着人口的外流；而迁入地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差、自然条件恶劣，但“地广人稀”，较易取得土地和得到许多政策性实惠，并有较好的开发前景，因此，这些地区的条件虽然相对恶劣，但对外来移民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清代向四川的移民，以及由内陆到边疆、由平原到山区的移民，正吻合了这一模式。

清代沉重的赋役负担所导致的人口迁移，同样值得注意。特别是在清初的战乱格局下，国库收入有限、财政窘迫，因用兵而带来的军费支出又不可稍缓，各种摊

① 档案，顺治十五年九月二日李粹然题：《为陈晋地艰难等事》。

② 《清世祖实录》卷81，顺治十一年二月甲申。

③ 方苞：《赠右副都御史赵公神道碑》，见《望溪先生文集》卷13。

④ 档案，顺治十年五月十二日车克题：《为遵旨条陈时宜事》。

⑤ 《清世祖实录》卷77，顺治十年七月壬寅。

⑥ 《顺治朝东华录》卷5，顺治十一年二月癸酉。

⑦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早就认为：“人口密度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着更加密集的人口。”（《资本论》第1卷，第391页）。这种对“人口密度”的理解，同样可以适用于一国之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区域，所以，对人口密度的阐释不可绝对化。

派、私征、预征、加征迭兴，使“数省皆困”、“十室九空”，不得不四处逃徙。^①这种逃徙，一在于躲避赋役；一在于从赋重地区逃往赋轻地区，清初湖广等省人民向四川的迁移有许多是属于这种情况，如湖北，“纳谷者则改本色为折银，其初原止每石二钱，厥后增至四钱六分六厘，自是民不堪命”，逃亡日甚；^②如湖南，赋税沉重，“追比难完”，“已存者又复逃亡，逃亡者难期再返”。^③直到康熙后期，湖广宝庆、武冈、沅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携家人蜀者”，仍“不下数十万”。^④

还必须强调指出，清代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也是导致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清初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战乱相继，人民死亡逃徙严重，安定局面、招徕流民、恢复社会经济成为有关政策的重点，是时惟恐劳动力不足，当然还谈不上人口压力。经过康熙年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复苏，人口增长加快，到康熙末年，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已经显现。在人口压力之下的隐忧，康熙末年以来的上谕和臣僚的上疏中已频频言及，并不是像有些论者所说的“浑然不觉”，还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统治者已经感到“江南、浙江生齿殷繁，地不加增，而仰食者日众”^⑤。此后，这一趋势在地域上扩大，在程度上严重起来。仅摘举有关上谕为证，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月上谕：“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所必然。朕洞瞩此隐，时深轸念。”^⑥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上谕：“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垦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由此观之，民之生齿实繁”^⑦。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十月上谕：“先年人少田多，一亩之田，其值银不过数钱，今因人多价贵，一亩之值竟至数两不等。即如京师近地，民舍市廛日以增多，略无空隙。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田少故耳。”^⑧

① 参见拙著《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310页。

② 光绪《应城县志》卷3《经政》。

③ 乾隆《长沙府志》卷22《政绩》。

④ 黄廷桂：《楚民寓蜀疏》，见雍正《四川通志》卷47《艺文》。

⑤ 《清朝文献通考》卷6《田赋六》，第4910页。

⑥ 《清圣祖实录》卷244，康熙四十九年十月甲子。

⑦ 《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

⑧ 《清圣祖实录》卷256，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丙子。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六月上谕：“条奏官员每以垦田积谷为言，伊等俱不识时务。今人民蕃庶，食众田寡，山地尽行耕种，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为积谷之计耶！”^①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三月上谕：“今太平已久，生齿甚繁，而田土未增，且士、商、僧、道等不耕而食者甚多，或有言开垦者，不知内地实无闲处。”^②

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上谕：“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贍给，偶遇荒歉，民食为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③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上谕：“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种，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④

雍正七年（1729年）四月上谕：“国家承平日久，户口日繁，凡属闲旷未耕之地，皆宜及时开垦，以裕养育万民之计。是以屡颁谕旨，劝民垦种，而川省安插之民，又令给与牛种口粮，使之有所资藉，以尽其力……”^⑤

有关上谕无不透露着对人多田少的忧虑以及劝民垦种、移民就垦的意旨。乾隆以降，人口的压力更为突出。至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登记在册的人口数已达1.43亿；乾隆十年（1745年），接近1.7亿；乾隆十五年（1750年），达到1.79亿；乾隆二十年（1755年），达到1.85亿；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超过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超过3亿；道光十四年（1834年），又超过4亿大关。^⑥ 人口增长的速度非常之快，而同期登记在册的全国土地总额却总是七百余万顷，人均土地自然是递年下降，概如表1所示^⑦：

表1

乾隆至咸丰朝人均耕地示例

年 份	耕地额 (顷)	人口数 (口)	人均耕地 (亩)
乾隆十八年	7 352 218	183 678 259	4.00
乾隆三十一年	7 807 290	208 095 796	3.75
乾隆四十九年	7 605 694	286 321 307	2.66
嘉庆十七年	7 889 256	333 700 560	2.36
道光二年	7 562 102	372 457 539	2.03
咸丰元年	7 562 857	432 164 047	1.75

① 《清圣祖实录》卷259，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丙子。

② 《清圣祖实录》卷268，康熙五十五年闰三月壬午。

③ 《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乙亥。

④ 《清世宗实录》卷16，雍正二年二月癸丑。

⑤ 《清世宗实录》卷80，雍正七年四月戊子。

⑥ 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第1辑，1979年。

⑦ 参见上揭孙毓棠、张寄谦文；另参郭松义《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5辑，1984年。

尽管数字统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与实际不会相差太远，表中所见的人均土地数量的下降正标志着人口压力的严重。这种人口压力的标志，当然是就全国情况而言，以清朝幅员之辽阔，经济发展之不平衡，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人均土地也就各不相同，这也正是由地狭人稠之区向地广人稀之区进行人口移动的前提和动因。

生活在乾嘉年间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1746～1809年）也感受到了“治平”之世人口的急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洪亮吉认为：“治平既久……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而人生所依赖的田地、房屋等社会生活资料的增长则缓慢得多，田地、房屋“不过增一倍而止”，“或增三五倍而止”，因此，“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再加上“兼并之家”的巧取豪夺，“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一般民众的生活更加困难，多有“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①，人口压力之下的矛盾也就更加尖锐。这也正如马克思针对当时中国人口的过剩所指出的：“这个国家缓慢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②

由人口压力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洪亮吉进一步说：

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需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需一二百矣。所入者甚微，所出者甚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勤，半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③

可见，人口的过度增加，导致了社会有关物资的相对贫乏、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和物价的上涨，导致了劳动者的终岁辛勤而难免饥寒待毙、铤而走险，因而也就影响到社会的安定。针对这种情况，洪亮吉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所谓的“天地调剂之法”；一是所谓的“君相调剂之法”。在“君相调剂之法”中，他认为，

^① 洪亮吉：《意言·治平篇》，见《卷施阁文甲集》卷1《洪北江诗文集》。按：洪亮吉所说的每三十年增加五倍的人口增长率，当然是过分夸大了。在前，徐光启（1562～1633年）在《农政全书》卷4《玄扈先生井田考》中已提出了“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参见张敏如的《中国人口思想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吴申元的《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4页。

^③ 洪亮吉：《意言·生计篇》，见《卷施阁文甲集》卷1《洪北江诗文集》。